

試論霧峰林家之 族性與族運

黃富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一、導言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漢人從 1630 年代荷蘭人鼓勵來臺後，人口大增。尤其在清朝統一臺灣後，至 17、18 世紀之交，大陸人口壓力嚴重，移民大舉入臺，逐漸取代原住民成為主要族群，促成臺灣的快速開發。移民之出身上至官紳，下至販夫走卒，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蓬萊島尋求發展的機會。

傳統漢人社會的組成單位是家，移民自然也組成家族。各家族有不同之背景，在臺灣之際遇與發展過程亦有異，因此也產生各自的族性與不同的族運。出身富豪士紳家族，「有錢講話會大聲」，享有發展的優勢，例如開八保圳的施世榜，第一代即為富紳。但出身平凡者則「無錢愛拼才會贏」，透過努力、際遇等因素，亦能出人頭地，成為士紳階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霧峰林家。

霧峰林家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族性、族運，在臺灣五大家族中尤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討。原因是，一者霧峰林家從 18 至 20 世紀均扮演重要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臺灣史的縮影。二者其發展史甚具戲劇性，霧峰林家堪稱邊區拓墾類型之代表，而且興衰交替迅速，充滿戲劇性甚或悲劇性。本文就以霧峰林家為範本，探討其族性與族運，以做為與其他家族比較的基础。

本文係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國史館「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四）演講稿。

林家系譜（數字為家中之排行）

- （一）林石（1）→林遜（1）→甲寅（2）
 →定邦（1）
 →奠國（2）
- （二）下厝（長房）：定邦→文察（1）
 →文明（2）
 →朝棟（1）→祖密（1）
- （三）頂厝（二房）：奠國→文欽（3）
 →獻堂（4）

二、開臺祖林石之拓墾邊區： 「愛拼才會贏」與武人族 性之起源

開臺祖林石（1729-1788）出身漳州府平和縣山區之平民，來臺拓墾原住民邊區，必須仰賴自身之努力與武力方能生存、發展，逐漸孕育出武人族性。

（一）開臺祖林石之出身：漳州府平和縣山區平民

開臺祖林石，生於1729年，是漳州府平和縣五寨墟莆坪社人。但據《平和縣志》，應為五寨社與浦坪墟。（註1）

平和縣位於福建西南山區，王守仁討平山寇後，因窮險，於1519年奏請設縣，屬於軍事性的縣。本縣山多田少，土壤貧瘠，謀生困難。（註2）《平和縣志》載「負山險阻，故村落多築土堡，聚族而居，以自防衛，習於攻擊，勇於赴鬥」；居民多向外發展，和

邑商人活躍於吳楚越廣。（註3）可見平和居民習於戰鬥，且謀生困難，多向外發展。這種環境自然影響林家在臺之發展模式。

《族譜》載林石「家有薄田」，「力田讀書」。查平和縣「五寨社學」，可能在此就讀。然因本鄉極為貧困，「慨然有遠大之志」。乾隆11年（1746），他十八歲時首度來臺，因母喪返鄉。18年（1753），背祖先骨骸移居彰化，入墾大里。

（二）林石之邊區拓墾致富：武人根性之起源（乾隆年間）

林家來自福建省平和縣貧民，開臺祖林石是經濟性移民，來臺之首要目標是致富，並以拓墾邊區為致富手段。

林家來自福建省平和縣，習於武事，清初開臺祖林石即在番界拓墾起家。林石於乾隆18年（1753）第二度來臺後，即選擇漢番界之大里杙（今臺中縣大里市）拓墾。大里杙位於臺中盆地東部，當時統治秩序未完全建立，仍有番人出沒，是以在乾隆3年（1738）總督郝玉麟在登臺、新莊設立義勝、永勝二寨，並在柳樹南莊口建營盤，置汛兵駐防。（註4）至乾隆51-53年（1786-88）林爽文之役時，大里杙因「逼近內山……藏奸其中，更不能問」，（註5）可見仍是邊陲險地。

林石何以會選擇危險之地大里杙呢？究其原因，一是家境貧寒，無力租買土地；二是邊區荒地多，偷墾不需成本，獲利率高，

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因此在此短期內，一個赤手空拳者竟能墾地約四百多甲，擁有萬石之租，成為地方富豪之一。(註6)此反映拓墾乃清初致富之捷徑，尤其是邊區，而林石適時掌握此一良機而暴富。林石致富後成為大里杙地方領袖，是林姓四大族長之一。

然而偷墾方式需冒生命的危險，他必需「負未枕戈」，耕戰並行，(註7)堪稱為林家之武人根性之最早起源。歷代子孫亦多向邊區發展，如其後之拓墾阿罩霧、林朝棟時之開山撫番，更增強其武人根性。

(三) 林家之第一次危機及其再出發：林爽文亂事後之經商致富

不幸，乾隆 51-53 年(1786-88)發生林爽文之亂，林石因被清廷認定是大里杙林姓四大族長之一，而被牽連緝捕下獄。《族譜》稱，福康安訊問後，認為被冤枉而釋放，但出獄時卒於「旅邸」。但這應該是諱筆，事實上是卒於獄中。因為亂後林家被抄家，子孫星散，流離失所，(註8)以致林家基業毀於一旦。此乃林家之第一次危機。

林家破敗後，約在乾隆 54 年(1789)，林石長媳黃端娘輾轉移居阿罩霧(今臺中縣霧峰)。此地更近番地，她重起爐灶，茹苦含辛，養育二子，(註9)日子極為難過。然而，上天已為林家開了另一扇門，即經商。

康熙末年後，臺灣農產日增，大量米、糖可供出口，與大陸之手工業日用品形成互

補關係，兩岸貿易日益興盛。雍正、乾隆年間，中部開發逐漸深入淺山地區，也形成一些內陸市鎮。大里即因有大肚溪可通舟楫，水陸交通便利，東有眾多拓墾前哨，成為貨物之集散中心，故商業興盛。而阿罩霧近山，富有山產，如籐、筍、木炭、野味等，可為商品。次子林甲寅(1782-1839)有商業長才，掌握時代脈動，在大里經商致富。他可能由小販而開店鋪，經營霧峰山產等，甚至「配米到大陸」；(註10)進而購地拓墾，成為中型地主，每年有約四千石之租穀。(註11)於是林家再度崛起為地方富豪，為日後子孫之發展奠定經濟基礎。

三、清季亂事與林家之晉身官僚：軍功晉身與武德傳家

致富是臺人向上社會流動之立足點，「衣食足而知榮辱」，不少人致富後，開始追求地位。在傳統社會，如欲更上一層樓，必須進入官僚體系。清代晉升為仕紳階級有二種管道，一是正途，即科舉，另一是非正途，即捐納與軍功。捐納自明代即已開始，清順治 6 年(1646)定有捐納貢生、監生條例，康熙 14 年(1675)又開捐實官之例，(註12)因此富豪之家可經由捐納取得某種官銜或官職。軍功是另一管道，在官府遭逢亂事時，募勇效勞，可獲取一官半職。

在大陸通常是經由科舉正途，但臺灣大多是透過軍功與捐納進身，亦即在官府有難

時，捐餉募勇，立功疆場，甚至純粹由捐納取得功名，霧峰林家是最佳代表。

19世紀中葉後（嘉慶後），清朝國事日非，內亂不絕，更爆發幾乎動搖統治基礎的太平天國之亂。臺灣士紳富豪大展身手，林文察即因捐餉募勇、立下軍功，而位居福建陸路提督，林家亦搖身一變而進身為官僚階層。此一際遇亦形成其強烈之武人族性，並影響其族運之驟起驟落。

（一）林家之第二次危機：地方豪族之爭鬥（19世紀上半葉）

林甲寅有二子林定邦與林奠國，乃中部大里、霧峰之中級頭人。當時此一地區有不少同級者，由於拓墾土地、水源之利害衝突與族間之糾紛，常有仇殺或械鬥事件，林定邦即在「前後厝林鬥」中，被草湖林和尚（媽盛）所殺。子林文察、文明又殺林和尚復仇，乃成為官府的通緝犯，（註13）此乃林家之第二次危機。未料，危機反成為更上一層樓的轉機。

（二）清季亂事與林文察、林文明之晉身官僚階層：武人族性之成形

道光、咸豐、同治年間乃清廷內憂外患時期，林文察、文明兄弟出錢出力，盡忠效勞，乃脫穎而出。其中林文察竟榮升至福建陸路提督（陸軍司令），在清代僅水師提督王得祿堪與相比，林家也因而晉身為官紳階級。林文察之功業大至可分三階段：協助平

定臺灣騷亂；參加太平天國之役；平定戴潮春之役。

1. 林文察捐餉募勇立功

咸豐4年（1854）小刀會黃位犯北臺之香山、噶瑪蘭、雞籠等地，林文察有將才，又家道富裕，獲臺灣當局赦罪，捐資募勇成為義首，在獅球嶺敗敵立功。其後協助平定岡山、斗六等亂事，並於7年（1857）捐銀助餉。（註14）咸豐8年（1858），因累積大功，獲賞六品翎頂，升為游擊，分發至福建任用。（註15）清代兵制，總督、巡撫之下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一般臺人只能充當勇首，少有人能進入正式軍事體制內帶兵立功。林文察竟以游擊之職，赴大陸參加各種戰事立功，堪稱奇遇。而他也不負所望，不斷立功升官。

2. 太平天國之役（1859-1863）：由游擊（1858）至提督

太平天國之役是清朝建國以來所遭逢之最大統治危機，因此不惜以優厚條件號召紳民捐餉募勇，協助平亂。林家之條件正符合時代需要：第一財力足，第二有鄉勇（子弟兵），第三有勇將文察、文明兄弟。太平天國之役是林家步上巔峰蛻變為紳宦之重要關鍵。

咸豐9年（1859），林文察率臺勇渡海西征，此後轉戰閩浙，弟文明與叔奠國亦參戰。他所率臺勇驍勇善戰，據稱，林文察

所部勇丁，「精熟火器，能臥地以趾駕鎗燃擊，無虛發」，故太平軍深畏之；有曰林文察「驍勇絕倫」；（註16）督總慶端亦然稱讚其「素稱謀勇」。（註17）因此屢立戰功，官位迅速竄升，由游擊而參將、副將，至同治2年（1863）躍升為福寧鎮總兵，進而榮任陸路提督，短短五年內連升五級，堪稱平步青雲。（註18）此在臺灣史上，僅有曾任浙江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堪與比擬，而自此林家蛻變為官僚階層，並成為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家族。

茲列其晉升時間如下：游擊（1858）；參將（1860）；副將（1861）；總兵（1862年7月）；提督銜（1862年7月）；福建陸路提督（1863年6月）；署理福建水師提督（1863年6月，未正式上任）。

3. 平定戴潮春之役

同治元年（1862），臺灣爆發戴潮春之亂，此乃繼朱一貴、林爽文之後的大亂事，直至同治4年（1865）方漸平息。同治元年（1862），林文明奉命返臺協助平亂。同治2年（1863）6月，林文察升至陸路提督，又奉總督左宗棠之命，帶兵返臺平亂。（註19）由於抗清領袖均係林家族敵，因此亂事漸平後，中部其他大族沒落，林家則蛻變為中部第一大家。（註20）再者，其弟林文明亦因功而升至副將，堪稱一門雙傑，林家家勢達到巔峰期。（註21）

此後下厝林家遂以武德傳家，文察子朝

棟，孫祖密，曾孫正熊、正傳、正亨、正元等人，自清代至戰後，數代均從軍。

（三）林家之第三次危機：林文明之血染公堂與皇官紳權平衡體

臺灣在1862年間爆發戴潮春之亂，奉命內渡的林文明得以返鄉平亂，但由於參與亂事者與林家平日素有怨隙，因此在平亂、事後處理叛產的過程中，又與鄰族結下更深的仇怨。另外，林文察、林文明兄弟一路攀升，在官場上因鋒芒太露而得罪丁曰健等人，引起福建省當局之嫉害。

首先是同治3年（1864）林文察之戰死漳州，林家失去主要支柱。其次，同治9年（1870），林文明被官員誘至彰化縣公堂，以謀叛罪，就地正法。林文察、林文明兄弟倆雖然戰功彪炳，卻先後死於非命，又以叛亂罪誅殺，為霧峰林家的前途蒙上一層陰影。

林家中挫的原因基本上可說是因林家之擴張威脅破壞皇權、官權之至高性，破壞皇、官、紳權平衡體。此可分四點：

1. 升遷太快遭嫉：林文察短短幾年躍居提督，成為僅次於巡撫的武官，閩官眼紅。

2. 文官武官：科舉出身之文官一向看輕僅憑軍功、捐納晉身之武官。

3. 不諳官場文化：林文明一再犯上，引起閩官之反感。

4. 中部之族鬥：最後，因平定戴潮春之亂，傷害鄰族利益而反彈，使閩官得以利

用。

綜合言之，在國家權力與家族勢力方面，19世紀中葉清王朝面臨席捲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之亂，故大舉利用地方家族勢力平定動亂，霧峰林家便依靠此契機興起。不過，清廷鑑於統治力之衰退，不容紳權侵犯或凌駕官權、皇權，因此林家觸犯了大忌而遭到強力壓制與懲罰，且面臨謀叛罪之惡名與懲罰，可說是林家之第三次危機。

四、林家之中挫與轉型：柔性族性之產生



林朝棟像

同治9年（1870），林文明以謀叛罪名遇害於彰化縣公堂，林家面臨空前危機。經多年纏訟，在林朝棟的主導下，至光緒7年（1881）妥協結案。（註22）林家既已發展為臺灣重要紳家，自然有重振家勢之強烈需要，因此在林朝棟的主導下，再度打入官僚階層，並發展為全臺第二大紳家。再者，林家之族性亦逐漸調整而趨向柔性，包括順服官府或轉向科舉文事。

（一）林朝棟之復興林家與族性之調整

清季臺灣之外患與內在需要提供林家良好的機緣，如中法戰爭、開山撫番、清賦之騷亂等。

1. 中法北臺之役

林家中挫後，清季又逢外患，如1874年之牡丹之役與1884至1885年之中法北臺之役。中法北臺之役是林家重振之契機，林朝棟募勇參戰，效忠劉銘傳，從而建立良好關係。

光緒10到11年（1884-85），中法戰爭擴及臺灣，清廷為解決兵源、餉需問題，號召臺灣紳民捐餉募勇，協助禦敵。霧峰林家自同治9年（1870）林文明遇害後，家運重挫，乃藉此良機效力清廷，以重建官紳關係。當時南、北防務分由臺灣道臺劉璈與督辦臺灣防務之劉銘傳負責，長房（下厝林定邦派下）林朝棟捐餉募勇北上效力劉銘傳，二房（頂厝林奠國派下）林文欽則南下協助臺灣道臺劉璈。

由於中法之役戰火在北臺，林朝棟大有表現機會。他在光緒10年10月中旬奉劉銘傳徵召之札後，立即北上，在11月初以前即已赴基隆參戰。（註23）光緒10年12月13日，劉銘傳奏稱：「郎中林朝棟急公好義，自備資斧兩月，募勇五百名來助防剿。臣設法湊解軍械，令赴暖暖，共圖捍守」。（註24）林朝棟驍勇善戰，不辭辛勞，在法軍攻占獅球嶺、暖暖之役中，立下不少戰功，贏

得各界之讚賞。基隆地區地形崎嶇，潮濕多雨，作戰極為艱辛。在 12 月 10 至 14 日之月眉山防守戰中，清軍與法軍「惡戰三日夜，……將士忍飢冒雨，目不交睫，遍身淋濕。曹志忠、林朝棟與各營官皆跣足督戰，泥淖滿身」，（註25）劉銘傳極為感動讚賞，向左宗棠報稱：「林朝棟與王詩正之兵最為奮勇。」（註26）

由於他與堂弟林朝昌（林文明長子），力守獅球嶺、苦戰月眉山，勞苦功高，劉銘傳因而代為上奏請雪林文明被殺之冤。（註27）雖未如願，然清廷重賞之，光緒 11 年 6 月 3 日，林朝棟以「道員，不論單雙月，遇缺儘先補用」。（註28）於是，林朝棟等人再度以捐餉、軍功方式開啟林家重振之門，尤其是下厝，在臺灣建省後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2. 開山撫番

原住民之不馴是引起清季臺灣外患的原因之一，也是清廷強化對臺統治必須處理的問題。最早提出開山撫番新政的是沈葆楨，時間是在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後，但執行效果不佳，終至被擱置。光緒 11 年（1885）臺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再度提出並積極推動。據筆者之研究，其所以再度推動固然由於建省之需，但也與林朝棟之主動倡議與全力支持，而且願意出任艱鉅之撫墾重任有關。（註29）

光緒 11 年（1885）10 月間，彰化、新

竹交界之罩蘭地方（在今苗栗縣卓蘭）生員詹景星等聯名數十莊以及道員林朝棟，先後稟報劉銘傳稱，該地屢有番害，自光緒 10 年 8 月至 11 年 9 月一年內，「被割去男女頭顱二十八級，槍斃四人」；另外，淡水縣屈尺莊董事劉夙夜亦稟稱，拳山堡大溪一帶，番害嚴重，自光緒 11 年正月至 10 月間，被殺男婦前後共十四人；以上二地均請求派兵剿撫。（註30）劉銘傳接報後，不得不提前處理撫番問題。關於罩蘭之番害，劉銘傳與林朝棟研議剿撫之策。劉銘傳之奏摺稱：

林朝棟家居鄰近，熟悉番情，當同面商剿撫之策。該道（林朝棟）性情豪俠，不避艱苦，力任其難。議將所部土勇千人，撥留一半駐防新竹、後壟兩處海口，該道自帶一營駐紮罩蘭莊，並派新竹紳士道員林汝梅會同前往剿撫，相機剿撫。……林朝棟甫經撥隊。……俟林朝棟所部剿撫如何，再行續奏。（註31）

可見林朝棟是剿番的先鋒，而開山撫番政策之提出乃二人商議之結果。光緒 12 年（1886）劉銘傳上摺稱，反對重開撫墾之官紳極多，唯有他與沈應奎（前貴州藩司）、林朝棟「力排眾議，一意經營」。（註32）

林朝棟之所以倡議撫番工作並出任艱鉅任務，公的理由是身為臺籍地方武官，職責上應為長官分憂分勞；但另有幾點私的

理由：第一是政治因素。林家在同治9年（1870）因林文明遇害，家運中挫而政治前途受阻，（註33）身為林文察嫡長子的林朝棟自然急於效命立功，以提升其家族的政治地位。第二是經濟因素。由於臺灣平地的開發已盡，且臺灣米、糖之大陸市場在清末已萎縮，經濟前景有限；反之，山區之茶、樟腦則市場廣大，出口猛增，利益優厚。林朝棟如能主導開山撫番事業，將可為林家開拓無盡的財源。

劉銘傳所推出之新撫墾方式，其主旨是由臺灣二大紳家林維源與林朝棟主導撫墾工作，官府則擔任支援工作。筆者名之曰「官紳合作型」，並已有論文申述，於此不贅。（註34）

光緒12年（1886）2月，劉銘傳奏請臺灣首富林維源「幫辦臺北開墾、撫番事宜」，（註35）光緒14年，又升為「幫辦臺灣開墾、撫番事宜」。（註36）林朝棟之職銜是「欽加三品銜辦理中路營務處，中路撫墾事務，統領棟字等營遇缺儘先選用道勁勇巴圖魯兼襲騎都尉林」，（註37）集籌劃、主持撫墾工作以及兵權於一身，可說中部山區的最高權力者。

此外，劉銘傳所推出之三項充實撫番經費辦法亦有助於建立林朝棟在山區之唯我獨尊地位。此即：一是裁減屯兵，將屯租撥入撫番經費；二是廢私隘而隘租歸官；三是山區物產之專賣，如樟腦、硫磺。（註38）其中裁私隘而隘防改由其所領之隘勇營負責，進

一步提高他在山區的主導權。廢隘後，林朝棟棟字營逐步接管隘防，並有隘勇營之新設，時間當是光緒12年下半。（註39）

由於採行積極的撫墾政策，侵犯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光緒年間的「番亂」多而嚴重，平亂成了劉銘傳的重要工作之一。臺東直隸州通判胡傳在巡視山區後，評曰「以撫為名，實則剿之而已。」（註40）林朝棟是主要的平亂將領，因而隨著墾區的拓廣與平亂的需要，棟軍的員額編制逐步膨脹，林朝棟的職權也日益擴大。（註41）

林朝棟有多次討伐原住民之役，如：(1) 罩蘭之役（光緒11年10月至11月）、(2) 大湖之役（光緒11年12月至12年2月）、(3) 西里興社獅潭社之招撫、(4) 蘇魯、馬那邦等社之役、(5) 新竹縣石加碌社、(6) 白茆與裡冷社之役（光緒13年8月至9月）、(7) 大崙崁之役（光緒17至18年）等。（註42）林朝棟盡心盡力效命，建立不少功績，因而屢受封賞。

其它，林朝棟尚有平定施九緞亂事等功績，林家再度躍居為重要臺灣士紳。

（二）林文欽之挫折與轉向

另外，林家之二房（頂厝）自林文欽後亦轉向文事。

林文欽，生於咸豐6年（1856）4月6日，卒於大正2年（1913）11月12日。（註43）林文欽性情溫和，待人誠懇，林家自遷居阿罩霧後，一向業農而習武，以武功貢

獻清廷而獲官職，唯獨文欽好學習文。（註44）光緒10年（1884），林文欽以二十九歲（實二十八歲）之齡入泮，兵備道劉璈「見而奇之」。（註45）

1. 林文欽之受挫

在逢中法之役時，臺灣道臺劉璈號召他募義勇，保衛鄉土。他集佃兵五百，器械、糧米均自己供應，支援南部之防務；其後又調駐通霄，同時也捐鉅款助軍。（註46）

由於湘軍、淮軍之不和，戰後劉銘傳彈劾劉璈，林文欽亦受累而被參劾。劉銘傳奏稱：

查林文欽與林朝棟親堂叔姪。林朝棟家道中落，尚肯急公好義，備資募勇，出力禦寇。林文欽為彰化第一巨富，縱不如林朝棟之仗義急公，乃經劉璈檄令帶勇，竟敢空少勇數、夫數，擅自離營，理應從嚴參辦。惟聞該紳係劉璈勒令帶勇，素昧軍營規制，與尋常軍營侵冒不同，應請旨將同知林文欽即行革職，勒令將所侵餉項銀一萬六千餘兩全數繳還，以示薄懲。（註47）

摺上後，清廷諭令「林文欽著即革職，核明該營空少勇數、夫數、餉銀若干，勒令呈繳」。（註48）

由上可知，中法戰後，林文欽因投效劉銘傳政敵劉璈而革去同知職銜，可說備受壓

抑。

2. 頂厝林家之轉向——文教型領袖之萌芽

林文欽原本好文，經此打擊後，拋棄林家尚武傳統，圖科舉進身。（註49）光緒12年（1886）5月1日《京報》報稱，林文欽透過林朝棟之協助，經劉銘傳奏准「開復文生衣頂」，（註50）取得應考資格。其後又獲註詮兵部郎中，逐漸改善與劉銘傳的關係。（註51）光緒19年（1893），他進一步以臺灣府附生資格考上舉人，同榜有彰化縣施士洁、洪謙光，苗栗謝惟岳（粵籍）、新竹李師曾等，共五人。（註52）筆者獲有其參加鄉試中舉之試卷，封面是「福建鄉試硃卷，光緒癸巳恩科」，內稱「中式第七十九名舉人林文欽」。（註53）

林文欽也盡力協助推行新政，尤其是清賦工作，光緒16年（1890）以清賦有功，賞加道銜。（註54）

此外，他多行善舉以取清廷褒揚，並提高社會地位。據《家傳》，光緒15年（1889），河南飢饉，文欽捐數萬兩巨款賑濟。（註55）惟據光緒14年8月10日清廷所批示之倪文蔚奏片，言「臺灣彰化縣候補郎中林文欽奉生母羅氏命，措銀一千兩，……捐助豫賑」，而奏准羅氏獲二品封典，可在本籍自行建坊，並照例給予「樂善好施」字樣。（註56）可知捐款年代為光緒14年，而非15年，而數目亦僅一千兩，而非數萬兩。

總之，林文欽自足於鄉紳地位，僅經營家業，孝親教子。光緒 25 年（1899），赴香港洽談樟腦業務與治痔，不幸病卒。（註 57）他生前樂善好施，贏得令名。據稱，因光緒 25 年曾出一千餘兩銀，消除福建泉州之械鬥，存活不少人，死後成為嘉義城隍。（註 58）

光緒 21 年臺灣割日後，下厝林家族人多回歸大陸而沒落，頂厝林家對清廷較不眷戀而多留臺，且因重文教而另闢蹊徑，家勢日隆。在日治時期，文欽之子林獻堂以其豐富學養與崇高人格，被奉為臺灣政治、社會、文化領袖，左右社會脈動，而頂厝林家也取代下厝林家成為霧峰林家之代表。

五、結語

中國社會流動的標準模式是經由科舉途徑而進身官僚，然而臺灣由於文教發展較遲緩等因素，不盡相同。臺灣的模式大致是，先拓墾、經商以致富，成為地方頭人；其後以捐納與軍功方式取得官職，林家乃一範例。

乾隆年間，開臺祖林石移居當時漢番交界之大里杙拓墾而致富，開啟武人族性之契機。至中期，林文察捐餉募勇、建立軍功以進入官僚階層，形成武家傳統，其後代林朝棟、林祖密、林正亨等均從軍。然而，因武人族性剛強而驟起驟落，在清代歷經三次危機，其中同治 9 年林文明之遇害最嚴重。

族性會傳承，但如遭逢挫折亦會修正，

林家至林朝棟時已轉型為忠君順服之紳家。而二房頂厝林文欽考中舉人，轉向文事，蛻變為標準漢人士紳。此一曲折的家族史正是清代臺灣社會流動模式的範例，甚至可說是臺灣歷史的縮影，此種模式之利弊得失、對臺灣社會與歷史發展之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註釋】

1.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臺北：自立晚報，1987 年），頁 29。
2.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25-26。
3.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26。
4. 《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頁 12。
5. 《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頁 363。
6.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61-62。
7. 《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98 種，頁 101。
8.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80-82。
9.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93-99。
10.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101-102；頁 107-108。
11.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102-106。
12.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北京：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50 年），頁 13-22。
13.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132-148。
14.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165-175。
15. 故宮檔案，《長本上諭檔》，咸豐 8 年 6 月 6 日，奉上諭。
16.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208-209。
17. 故宮檔案，《林文察列傳稿》，頁 21。
18.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 181-206。

19. 同治2年6月28日，林文察，「謝授福寧鎮並署陸路提督恩」，《軍機處奏摺錄副》，92144號。
20.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頁269-299。
21. 同治3年3月23日諭，「徐宗幹片」，《軍機處奏摺錄副》，95239號。
22.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年），頁397。
23. 劉銘傳，「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收入《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27種，頁181-182。按：臺灣上摺通常需一至三月方能至北京獲得批示，故疑本摺乃上摺織繡正版。
24. 光緒10年12月13日批，劉銘傳奏「為臺北紳民捐資募勇，屢次禦敵獲勝，並各軍現在分籌防守情形」，《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3995。
25. 「閩撫劉銘傳、提督孫開華奏臺防戰勝並戰守情形摺」，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198種，頁159-160。
26.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1964），奏稿，卷64，頁2532。
27. 劉銘傳，「奏雪林文明冤殺片」，《奏議》，頁383-384。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頁401-402。
28. 劉銘傳，光緒11年5月12日，「基隆法兵全退，臺北解嚴，請獎戰守各員紳摺」，收入《劉壯肅公奏議》，頁376-377。
29. 黃富三，〈從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看清廷、地方官、士紳的互動〉，《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2000），頁1172-1175。
30. 劉銘傳，「剿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摺」，光緒11年10月29日，收入《劉壯肅公奏議》，頁199。
31. 《劉壯肅公奏議》，頁200-201。
32. 《劉壯肅公奏議》，頁206-207。
33. 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
34. 黃富三，〈板橋林本源家與清代北臺山區的發展〉，《臺灣史研究》，第2卷第1期，頁5-50。
35. 《清德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193種，頁212；《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195種，頁301。
36. 《清德宗實錄選輯》，頁234。
37. 《淡新檔案》，17329-27，光緒12年8月27日，林朝棟移文新竹縣令方阻蔭，「辦理中路營務處中路撫壘事務統領棟字營為移知事」。
38. 黃富三，〈從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看清廷、地方官、士紳的互動〉，頁1181-1187。
39. 鄭喜夫，《林朝棟傳》，頁94-95。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71種。
40.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304種，頁55。
41.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169。
42. 相關戰役亦可參考楊慶平，〈清末臺灣的「開山撫番」戰爭（1885-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43.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臺灣霧峰林氏族譜》，頁113-114。
44.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
45.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
46.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月摺檔》，光緒十一年十月十八日，錫珍、衛宗光奏「為查明已革道員被參各款，訊有贓私實據，按例定擬摺」。
47. 同上，頁440。
48. 同上，頁440。光緒11年10月3日，《申報》，〔27〕，〈劉銘傳片〉。
49.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臺灣霧峰林氏族譜》，頁113-114。
50. 光緒12年5月12日，《申報》，〔28〕，「劉銘傳片」。
51.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臺灣霧峰林氏族譜》，頁113。光緒16年10月30日，《申

報》，劉銘傳，「續錄全臺清賦請獎名單」。

52. 《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30種，頁402。
53. 此件取自頂厝林家，並感謝林博正先生之贈與。
54.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光緒16年10月30日，《申報》，劉銘傳，〈續錄全臺清賦請獎名單〉。
55.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
56. 光緒《月摺檔》，光緒14年8月10日，「倪文尉片」。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3。
57. 林獻堂，〈先考林文欽公家傳〉，頁114。
58. 〈為神無愧〉，《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27日。

學術獎勵



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申請

國史館為鼓勵撰寫中華民國史及臺灣史相關研究論著，培養國史研究人才，每年獎勵出版博、碩士學位論文。

申請資格

1. 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碩士學位論文。
2. 申請出版之學位論文以未曾出版為限。
3. 申請者論文須與中華民國史及臺灣史相關。
4. 每人每年以申請一冊為限。

受理申請時間

每年12月1日於本館網站公告，接受申請，至翌年2月底截止，以郵戳為憑，6月30日於本館網站公布錄取名單。

申請辦法請參見國史館網頁：

www.dnrh.gov.tw 「修纂研究」項下「學術獎勵」